

【名家背影】

□戴永夏

1980年初春,刚刚创刊不久的《中学时代》杂志开设了“名人的中学时代”专栏,需要约请名人撰稿。作为该刊的编辑,我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寄小读者》等优秀作品影响了几代青少年的文学泰斗冰心,决定到北京采访她,向她约稿。

冰心(1900—1999)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她的作品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她一向热爱孩子,关心青少年,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写出了《寄小读者》、《往事》、《山中杂记》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品。

1980年2月28日午后,我乘车来到中央民族学院校园,冰心老人就住在院内和平楼208号——一座普通职工宿舍楼的二楼上。我事先连招呼也没打,就冒昧地敲开了她家的大门。适逢冰心老人和丈夫吴文藻教授都在家中,她听说我是从外地来的,便热情地把我引进那间简朴的客厅中,同我亲切交谈起来。这间兼作书房的客厅面积并不大,房间内整齐地摆放着放满书籍的书架、样子古朴的桌椅和套子已经破损的旧沙发,简单、普通却又整洁、高雅。冰心虽已八十岁高龄,但行动灵便,谈吐机敏,一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显得睿智而又慈祥。对于我提出的如何办好少儿刊物的问题,她十分真诚地告诫我说:“办少儿刊物,眼睛不要老盯着名人。名人文债多,又不一定熟悉少儿生活,写出的文章不一定篇篇都有名。如果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个人,老是那么几句话,也就没什么意思了。刊物要办好,办得有生气,应当多找一些新人写稿,如中学师生,他们有生活,有感受,写出来的文章就生动,有感染力……”我听后深受感动,并试探着约她为刊物写点文章。但由于她即将去日本访问,时间仓促,她又不愿用一些“老生常谈”来敷衍小读者,所以未答应撰稿。但她那谆谆教诲对我们明确办刊方针、把握办刊方向、办好少儿刊物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事隔三年后的1983年4月初,我又一次到北京组稿。4月3日,再次拜见了冰心老人。

冰心仍住在原来的那座旧楼上。比起三年前,她的身体衰老了许多。因在两年前患了脑血栓,右胳膊又不慎摔折,所以她写字、走路都不那么灵便了。然而她的头脑仍很清醒,她听说我是山东人,便兴致勃勃地谈起她曾生活了八年之久并视为“真正的故乡”的烟台以及她“灵魂上的故乡”山东。她对纯朴的山东人很有好感,对山东充满深情。她说,除烟台外,她还到过济南、青岛两市,但都是车船过往,未能久留。倘不是年迈多病,她真想重游山东,重温那甜美的童年之梦……她这番热情洋溢的话,一下

【读书杂感】

□丁辉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讲到“三味书屋”的牌匾下挂着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古树”者,谐音“古书”也;“鹿”者,禄也;“鹿”而“肥”,高官厚禄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科举时代读书无非就是富贵的敲门砖,说得好听一点儿,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得难听一点儿,还不就是当官发财。

此种借音取义的“寓意画”自非中国艺术的主流,在民间却广有市场。蝙蝠长相酷似老鼠,于是有一种传说,蝙蝠是老鼠误食巴豆后变的。古希腊的伊索老头因其“似鸟非鸟”、“似兽非兽”而赋予其“骑墙”性格,蝙蝠在西方可谓受尽奚落。然这种丑八怪在中国却因其名字中“蝠”与“福”的谐音关系独享一分尊荣。大户人家门厅上的浮雕往往有五只蝙蝠,寓意“五福临门”也;年画上画一只蝙蝠与桂花数点,“福增贵子”也;把蝙蝠刻在一只寿桃上,“福寿延年”也;把多只蝙蝠刻在一只寿桃上,“多福多寿”也……

周氏兄弟早年在绍兴乡间没少受此种民间艺术“精神”的濡染。周作人《苦茶随笔》里有一篇《画廊集序》,讲到北方的年画,南方谓之“花纸”,其幼年见到的花纸上,便有些寓意画的内容,“譬如松树枝上蹲着一只老猢猻,枝下挂着一个大黄蜂窠。”知堂先生没有交代这幅“花纸”的寓意,当然是因为中人之资便可一望而知,不值得多费笔墨:蜂者,“封”也;猢猻即猴,猴者,“侯也”。合在一起即是

一片冰心在玉壶

——三次聆听冰心大师的教诲

子把我带进了她在《寄小读者·通讯三》中写的山东印象:

今早过济南,我五时便起来,对窗整发。外望远山连绵不断,都没在朝霞里,淡到欲无。只浅蓝色的山峰一线,横亘天空。山坳里人家的炊烟,濛濛的屯在谷中,如同云起。朝阳极光明的照临在无边整齐的整齐的田畦上。我梳洗完毕凭窗站了半点钟,在这庄严伟大的环境中,我只能默默低头,赞美万能智慧的造物者。

过泰安府以后,朝露还寒。各站台都在浓阴之中,最有古趣,最清幽。到此我才下车稍稍散步,远望泰山,悠然神往。默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四句,反复了好几遍。

……

山东是我灵魂上的故乡,我只喜欢忠恳的山东人,听那生怯的山东话……



▲1980年4月,冰心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前往日本访问。图为团长巴金(左一)和冰心在首都机场。



▲1947年,冰心夫妇与小女儿吴青(中)合影。

当我再次请她为《中学时代》撰稿时,她欣然答应下来,并问了交稿时间,让我留下姓名、地址,说:“回头想想,有可写的,4月底前写好寄到济南。”

告辞时已是下午4点多。冰心老人虽然行动不便,但还是吃力地拄着拐杖,从座位上站起来,目送我出门,并让家人送我下楼……

回到济南后,我一直盼着冰心老人的来稿,同时又担心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她毕竟身体欠佳,又实在太忙、太累了……没想到才过了十来天,她就将亲笔撰写的《我的中学时代》一文寄到了编辑部。看着老人那清秀、工整的笔迹,我真有些喜出望外。文中,老人用她惯用的简洁、优美、朴实的文笔,深情地回忆了六十多年前她在中学时代的生活情景以及他们同学间的亲密友谊。文章刊出后,得到许多读者的赞扬。

第三次得到冰心老人的教诲,是在1985年。这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写的《自然·生活·哲理》一书出版了。该书收有29篇哲理散文,其中一篇是我的《落花吟》。可喜的是,该书由冰心撰写序言。序中,她首先对书中的文章进行了总的评价,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写了《自然·生活·哲理》一书,让我作序。我从头看了这集子里的三十九篇散文,觉得这些散文文字优美,思想健康,可以作为一本很好的青年读物,便欣然答应了。

……

这本集子里三十九篇散文的作者,都是生活在80年代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他们有坚定的信心、远大的理想、美好的希望,因此这些文章的情调是优美的、健康的、引人向上的。作者以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的景物,大之如山岭园林,小之如花草树木、虫鱼鸟兽,触景生情,借物言志,情高意真,读了使人欢欣,奋发。我在每篇读后都摘录了文中的警句。

接着,她摘录了秦似、金马、韩少华和我等六位作者文章中的警句,摘录我的是:戴永夏的《落花吟》:“她不消沉,不悲观,‘得意淡然,失意夷然’,总是专注地倾心于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地作着‘护花’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冰心在摘录我的文章时,还顺手将原文中的“失意泰然”改为“失意夷然”。泰然跟夷然是近义词。泰然是安然、从容的意思;而夷然除包含泰然的意思外,还包含坦然的意思。宠辱不惊,既安然又坦然,显然文意又进了一层。这一字之改,却为拙文增光添彩。所谓“一字师”者,岂非此也?

(本文作者为作家、编审)

从三味书屋里那幅画说起

拜相封侯,大富大贵之意也。

“寓意画”虽然有时候或可依马列文论的“人民性”理论勉强解作“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究其实质却是前现代“巫风”之遗留。胡适1928年写有《名教》一文,胡适引《礼记·仪礼》中的“名,书文也,今谓之字”,释“名教”为“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豆腐店老板梦想发大财,便请村里的王老师写副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也可以过过发财的瘾了。王乡绅也有他的梦想,于是也写了副对联“总集福荫,备至吉祥”。胡适所举例子中尚有济南事件发生后,街上到处是标语,有写“枪毙田中义一”的,有写“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杀尽倭贼”而把“倭贼”两字倒转来写,“倭贼”倒写,“倭贼”也算打倒了。这些和小区墙上经常见到的“xx的王小三不得好死”属“其事固异,其理则同”类。若依胡适对于名教的解释,借音取义的寓意画实为拐了点弯儿的从而也就不那么质朴的“形象”化了的名教思想而已。

寓意画因其既浅且俗,如前述并非中国艺术的主流,但若说对主流艺术精神毫无影响,也并非实情。前阵子在某珠宝类节目上得睹民国时期画坛名宿汪榕先生的一幅花鸟立轴,画面上有石榴,石榴多子,寓意“多子宜男”;石榴上栖息的鸟为白头翁,寓意“白头偕老”,这幅画明显是汪老为某户人家结婚志喜而画,至于是因为迫于生计还是为了友情难

到过曲阜孔子墓的人都知道,孔子墓前竖立着一块庄严肃穆的金字小篆石碑,由于墓碑前面有一块高高的供台,我们平视所能看到的碑文,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出于好奇之心,走到供台前踮起脚尖欠身向下看,或者转到墓碑的一侧去看,才发现原来整个碑文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墓”。

在我们的印象中,碑文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孔子墓前的这块墓碑却略显“羞涩”,以至于我们很难从正面直视其全貌。之所以如此,目前公认的原因是为了不让前来祭拜的帝王看到碑上的“王”字,以免其产生尴尬和不满。对此,民间又有如下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乾隆皇帝登基后首次来拜祭孔子,但他看到墓碑上的“王”字后却踌躇不拜,随从人员就让人书写“先师”二字

【碑刻漫话】

孔子墓碑的传说与真相

□杨加深

将“王”字挡住,乾隆才肯行跪拜大礼,此后孔子后人便将供台加高,挡住了“王”字的最后一横;第二种说法认为,出于同样的目的,孔子后人嘱咐工匠把碑中的“王”字一竖尽量拉长,以至于以后皇上再来祭祀孔子时,从正面看不到这个完整的“王”字;第三种说法是自古以来就有“二王不能相对跪拜”的忌讳。

其实以上说法都不见于史籍,但孔子墓碑的特殊设计又必然有其渊源。我们不妨从历代帝王对孔子封号的角度做一番历史考察,以便得出相对有说服力的推断。

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孔子去世后,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不断追封追谥。最早的追封是西汉元始元年(公元0年)汉平帝追封的“褒成宣尼公”,直到唐代之前,帝王们对孔子的封号都是“公”、“父”、“师”,如北魏孝文帝封的“文圣尼父”、北周静帝追封的“邹国公”、隋文帝封的“先师尼父”、唐高宗李治封的“太师”、武周武则天封的“隆道公”等,以上封号,有的是爵位,有的是敬称或尊称,地位上没有与帝王们平起平坐。

然而,唐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其中,“文宣”为谥号,“王”也只是个爵位,其地位相当于周代的“武王”或“成王”。尽管如此,孔子的地位却第一次被提升到与古代帝王并驾齐驱的高度。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又改“文宣公”为“衍圣公”,此称号自此相沿不改。西夏仁宗三年(1146)颁布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地位与“王”没有差别。

至于孔子墓碑上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称号,是元朝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加封的。而该墓碑立于明朝正统八年(1443),碑阴(碑的背面)刻有正书“奉政大夫修正庶尹礼部郎中赐食三品禄直文渊阁永嘉黄养正拜书”,下款书“大明正统八年岁次癸亥十月一日五十九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彦缙五十八代孙承事郎曲阜世职知县孔公堂等立石”,可见碑文上使用的仍是元代的封号。其实明朝对孔子另有封号,即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封的“至圣先师”,但这个时间晚于立碑时间87年。

那么,上述两种传说,哪种更有可能接近史实呢?从文字学和书法学的角度分析,显然孔子后人嘱咐工匠把碑中的“王”字一竖尽量拉长的说法是不合适的。因为篆书中的“王”字,在甲骨文中本写作一把战斧的样子,用来象征至高无上的王权。金文中就有了类似于小篆中上下两横间距小,下两横间距大的写法,而秦小篆延续了这个传统。之所以篆书中的“王”字三横之间间距不等宽,一是由于甲骨文中“王”字的传统,二是为了和篆书中的“玉”字相区别。所以,孔子墓碑中的“王”字是标准的小篆写法,不存在故意将竖画拉长之说。至于“二王不能相对跪拜”的说法,至少要有个具体的时间范围才能说得通,比如将孔子封为“王”的元代和嘉靖九年之前的明代,就不应该有这种忌讳。

康熙首次拜祭孔子墓时因见“王”字不愿跪拜的说法,虽不见于史料记载,但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史实也不尽如此。实际情况应当不是“王”字的问题,而是封号的问题。因为清顺治二年(1645)清世祖又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这是清代官方对孔子的封号,而碑上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封号是元成宗所封,明人黄养正所题写的墓碑,用的仍是元朝封号。既然清代有对孔子的封号,而孔墓上的碑文中却未体现,乾隆看了当然不高兴。这就和传说中当乾隆拜祭孔子时,随从请人先写“先师”二字将“王”遮住的故事相吻合了。

文物毕竟是文物,不能因为改朝换代就随便销毁或更改。于是,自康熙拜祭之后,孔子墓碑的供台设计就变成了如今所见的样子,而其背后的原因,也就演变成上述似是而非的传说。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本文作者为宿迁学院中文系教授)